



龙门浩 水上行帮的乱世哲学

行帮齐聚 演绎另类山城

晚清至民国，位于重庆水陆两栖交通中显要地位的龙门浩，让原本单纯且彼此竞争的同行搁置争抢，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关系。毕竟一方面人在乱世，谁也难以独立求生，只能抱团互助；另一方面政局不稳，社会上尔虞我诈，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

于是，除了茶馆林立，龙门浩还诞生一个组织：行帮。这是一个介于行业公会和地下帮派的组织，他们有自己的严格规矩，任何成员不得违背；有自己的特殊节庆，祈求平安；有把头、会首或者代表作为首领，平衡内部利益和版图划分，对行帮成员进行保护。

行帮的兴起和官府的推波助澜也不无关系，因为官府既可抽捐抽税，又可以此为桥梁上下联系，获取经济信息，防止盲目生产、避免商品滞销和推动竞争。当时龙门浩行业复杂，行帮复杂程度在重庆首屈一指，大致分两类：一类行帮偏“行”，如豆芽帮、药帮、饴糖帮等，连棺材、冥器、木、竹、炭、石灰等都有自己独立的行帮；另一类偏“帮”，以水陆七大帮派为主，毕竟交通才是龙门浩最炙手可热之处，天然凝聚着恩怨情仇，何况干这行的都是出力气的，最讲江湖义气，自然多少有了水泊梁山的感觉。

双雄并起 平分水上春秋

在龙门浩，上、下浩两个船帮代表着水上交通的传统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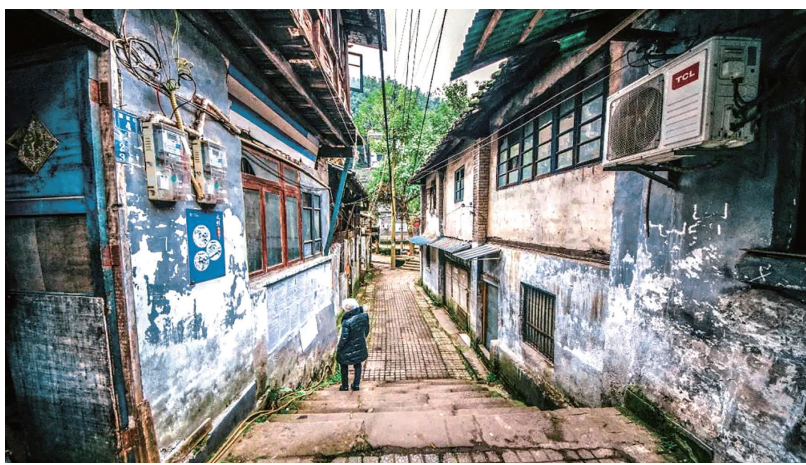
上浩船帮源于清末民初，以上浩的龙门浩老码头为中心，航行于老码头到重庆太平门一线。后龙门浩的手工业作坊逐渐发达，需从城内购原料再制成成品运进城销售，渡船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战火年连，官差频繁，渡船中有狡黠者为迎合官府，倡议将码头上的渡船组织起来，成立船帮“老爷会”。在信仰上供奉“镇江王爷”，祈求平安、统一思想。在领导上选出会首，作为行业执事人和帮派老大。在制度上，“定股”，船股限制四十股内不得增加；“确权”，“输子”（即船股）拥有航行所有权和租转权；“特许”，有船无轮子者不得经营；“定薪”，规定无船股的工人待遇和规矩。

在上浩船帮兴起之时，下浩也有渡船往来，不过船只零散、路线也不固定，处于各自为政状态。后来黄楠渡经常发生海损事故，鹿角、长生乡等地的农民和小贩需要运送货物前往东水门，先部分转移到上浩老码头，后来发现通过上浩船帮的线路到太平门还需辗转。下浩的渡船看到了商机，由于没有组织，也无航线的约束，他们纷纷开辟新航线，出狗钻洞绕梁外镜平石，顺流到东水门。同样由于没有组织约束，下浩的船只航行方案非常灵活，在枯水时停太平渡，洪水时便改到下浩门朝街河边，航行效率和适应能力极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信仰、制度、领导上借鉴上浩船帮，也成立起自己的行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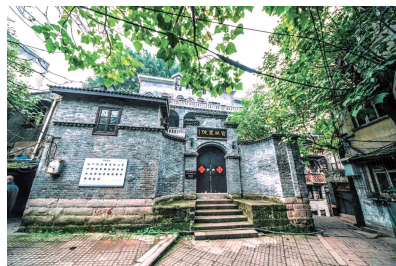
下浩船帮起源的特殊原因使他们从一开始便打下了善于革新的烙印，发展中，他们改会首为干事或代表，由每两年的“王爷会”改选；业务上摒弃上浩船帮航线固定、规矩严格等传统，突出优势特长，做大货运部分，后来成立驳船公会特许专营；运作上也和官府走得更近，当然在获得更多经营特权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开销，不过船帮很快便推出卖“空船轮子”的方儿弥补开支，灵活经营。

□寒溪夜浣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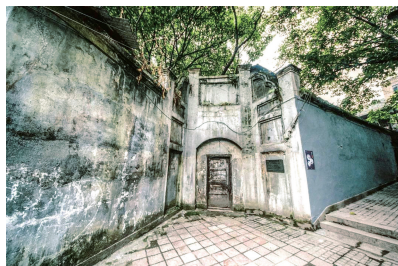
重庆城的立体奇幻人所皆知，轻轨、索道、缆车、船舶、大扶梯……各种工具构成了山城独一无二的交通体系，即使向前追溯百年依旧如此。人们凭借着一切可以想象且可以利用的方式腾云上山、劈波斩浪，只是交通的主角从机器变成了人，而有人地方就有江湖，山水交通碰撞的龙门浩自然就成了江湖中最为波涛汹涌的地方。



龙门浩码头附近老巷。



昔日龙门浩地区云集了大量国内外富商，他们为划子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龙门浩的大户人家宅邸。

异军突起 煤船帮与划子帮

其实，彼时的龙门浩还是一个煤码头，不过和白庙子、黄楠这样的煤码头却大不相同。当时重庆的煤炭均来自天府矿，然后经嘉陵江进入长江，长江沿岸的花街子碁渝茶社和嘉陵江沿岸的姚家巷蔡鸿发茶社是著名的煤炭市场，成交后便会用船运到龙门浩出售，同时南山上也有一些小煤矿，所以龙门浩煤炭业空前繁荣。煤要在江里走自然需要船，煤商们怕船帮索要高额运费，与其受制于人，不如自己干，于是纷纷拨款造驳船，承运自己矿里生产的煤炭，煤商会亲自指定一个船工为组长，领导驳船工人，工人的工资分级核定。这些专营运煤的船只积少成多，最后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煤船帮。

和煤船帮类似，划子帮的起源也来自龙门浩特殊的环境。作为重庆开埠时期的重要区域，龙门浩云集洋行、工厂、兵舰、商船，老外初至时多少有些顾忌，于是也自行修造小木船，作过江或接送宾客之用，船工也不用船帮的人，而是另外雇佣新人，每船2~3人，给予固定工资。后来龙门浩工商业发展，发



残存下来昔日码头的设施。

了家的富豪们觉得这做法相当不错，一则自己的船只和船工，比较放心；二则作为专船，也忒有面子，于是船只不断壮大。民国年间，驻重庆的军阀混战，无偿征用全市运人渡船在嘉陵江搭建浮桥，上浩船帮自然首当其冲，船帮人员面临巨大的生活危机，当时划子帮尚未产生，停泊在龙门浩的“万流”“万县”等外国商船希望上浩船帮帮忙运送货物，上浩船帮本可借此缓解危机，却依然与下浩船帮驳船公会协商，采用“打关”办法，船股平分，工人众议。抗战胜利后，运人业务清淡，上浩船帮再次面临危机，上浩船帮仅靠市社会和警察局等负责人说情，让下浩船帮分出个别货运业务，勉强解决船户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当煤炭积压滞运，远超过了煤船帮的运载能力时，部分生活困难的上浩船帮工人结帮偷偷渗入运煤，两大帮派陷入了两难境地。煤船帮急需船只和工人，但又必须入行入帮，上浩船帮面对帮内人员破坏规矩但又不想开除工人，任何一方稍有动静就可能剑拔弩张，但最后双方还是以“不允许、不反对”的默契了事。

水上四帮 乱世一股清流

水上四大帮派共同抢夺着渡江运输的业务，却罕有争端，虽无相濡以沫的合作，却有着相忘于江湖的境界。大家每天擦肩而过，却似乎完全感受不到对方的存在，这和他们世代与水共生形成的江湖哲学不无关系。

从内部来看，这些船帮人世代与水打交道，深知水既是生活所依，也是危险所在，水上的任何纷争都可能舟覆人亡。正因如此，他们尽管各自理念不同，但都信仰同一个神——镇江王爷。每年都固定举行仪式，齐聚一堂，请出造船业“掌墨师”主持祭祀王爷菩萨。特别是端午节，各船工都要参加龙舟竞赛。上浩船帮是老大哥，用的是最有气势的青青龙，龙头龙尾供在老码头的观音阁，竞赛时踩头的帮首杨焕堂总是倒立船上，用双脚指挥，堪称一绝。划子帮组建最晚但最有钱，用的白鹤龙也最时尚，龙头龙尾供奉于下浩龙门寺内，由哥老会大爷陈敬之踩头，划手穿靓丽的白色服装。下浩船帮和煤船帮虽没有特定的龙舟，但也要加入其间，四大帮派形成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从诞生开始，所有帮派便一直在寻找和谐相处之道，业务各有偏重，制定了严格的界限，竭力避免恶性竞争。下浩船帮航线往返东水门和下浩，东水门后来成为了货物的集散地；下浩船帮近水楼台先得月，驳船大宗业务接洽都在东水门外茶馆，小宗业务则在下浩码头兼办，船帮在两地都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文书等。而上浩船帮从无抢夺之心，依然固定往返太平门和上浩，太平门是人进出的大通道，于是专营载人摆渡，把货物运输全让给了下浩船帮。煤船帮只运煤，划子帮只搞“专车”业务，相当包容和客气。

值得一提的是上浩船帮，按理说起源最早，体系最完善，在下浩船帮散兵游勇、煤船帮和划子帮新生之时，完全能以大打小占领市场，但上浩船帮却始终严守自己的航线，区域上和下浩船帮严格区分，业务上只载人运货。民国年间，驻重庆的军阀混战，无偿征用全市运人渡船在嘉陵江搭建浮桥，上浩船帮自然首当其冲，船帮人员面临巨大的生活危机，当时划子帮尚未产生，停泊在龙门浩的“万流”“万县”等外国商船希望上浩船帮帮忙运送货物，上浩船帮本可借此缓解危机，却依然与下浩船帮驳船公会协商，采用“打关”办法，船股平分，工人众议。抗战胜利后，运人业务清淡，上浩船帮再次面临危机，上浩船帮仅靠市社会和警察局等负责人说情，让下浩船帮分出个别货运业务，勉强解决船户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当煤炭积压滞运，远超过了煤船帮的运载能力时，部分生活困难的上浩船帮工人结帮偷偷渗入运煤，两大帮派陷入了两难境地。煤船帮急需船只和工人，但又必须入行入帮，上浩船帮面对帮内人员破坏规矩但又不想开除工人，任何一方稍有动静就可能剑拔弩张，但最后双方还是以“不允许、不反对”的默契了事。

不管怎样，比起龙门浩陆三帮力帮、滑竿帮和马帮的硝烟四起，水四帮在那个乱世可谓是一股清流。



龙门浩码头树立的景观还依稀唤起当年船帮的记忆。